

《素食主义者》对于“王后窥镜”的突破

朱 卿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亚洲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在小说《素食主义者》中,作者韩江巧妙地利用英惠与仁惠姐妹间存在的“隐含文本”表达形式试图向读者表露英惠与仁惠经历的苦难,以此揭示当今韩国社会中依旧坚如磐石的父权结构下女性处于劣势的、被牺牲的处境;同时,韩江将女性置于“悲剧本”中,以此超越了男性权威下限定的女性理想模式。韩江通过小说《素食主义者》展现了韩国当代女性作家身上特殊的感情,为我们理解她们以文学与人文关怀相融合的形式努力突破男性文本窥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素食主义者》;隐含文本;悲剧本;女性作家;窥镜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4-0073-05

一、序言

韩国新生代小说家韩江凭借《素食主义者》(2007年出版)获得2016年度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亚洲作家。同时,获奖后的小说销量较之前增加了近12倍,创批出版社^①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素食主义者》在韩国国内销量已突破68万册^[1]。可以说,韩江作品的畅销本身就揭示了问题,凸显了韩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积习并廓清了韩国女性的处境。

何为王后的窥镜?显然,此处借助的是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的解释:女性创造力、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文学父性特征的隐喻^{[2]3}。简言之,这即是指男性/男性文本的权威。韩国“三·一”运动^②以降,女性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且已成为当代韩国社会诸多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无可否认,长久以来在父权制传统意义上,性别的二元划分是不对称的,男性是主体,而女性是

他者,她们顺从男人的意志并禁锢在内在性中。于是,对女性来说,她们只是被男性控制和设计出来的,她们具有满足男性性欲、生育和料理家务的职能;除此之外,她们什么也不是^③。因此,在文学父性特征的隐喻中,女性仅仅是男性创作的产物,她们被迫拘禁在男性创作的框架之中。

不过,马克思曾经阐明:“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586}在韩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女性文学开始萌芽,女性作家相继崭露头角并用女性的声音向男性宣称:“女子既不是弱者,也不是无知者;只有不忘记自我,才能真心爱别人;在成为妻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4]5}在当时的韩国社会,文学可能成为女性,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向时代“发声”的主要活动空间。20世纪80年代,“双职工夫妇”现象的出现使得部分韩国

收稿日期:2021-03-11

作者简介:朱卿(1993—),女,山东淄博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创批(Changbi Publishers)出版社成立于1974年,是出版季刊《创作与批评》及文学、人文、社会、教育、儿童青少年、教科书领域单行本的出版社,至今出版书籍3000余种,每年出版270多本新书,是韩国最受读者信赖的出版社之一(创批官网.公司简介:创批[EB/OL].[2020-11-11].<https://www.changbi.com/company-info/company-about>.)。

②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实行武力统治,韩国人民不堪屈辱,于1919年掀起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三·一”爱国独立运动。“三·一”独立运动因为领导阶级的软弱和准备不充分等原因,没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它迫使日本改变了对韩国的殖民政策,即由强硬的武功改为较为温和的文治,韩国人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言论和出版自由(见金英今《精编韩国文学史(中文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③日本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将这一点解释为: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译者)”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女人——译者)”等(第34页)。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发生反应(第1页)(见上野千鹤子著《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

女性在经济上开始独立并不断冲击着父权体系。2016年5月17日,江南站杀人事件^①爆发,反“厌女(misogyny)”运动在韩国开始蔓延,直至2018年MeToo运动^②席卷整个韩国,这些运动激起了人们对于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关注。韩江等女性作家一系列作品的畅销便是有力的佐证。

由是观之,在文学创作中女性作家怎样对抗以父权为中心的文学权威从而真正走向文学自主?韩江的小说《素食主义者》可以被视作面向该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向我们展示了在现代化外表下隐藏着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思想的韩国社会中,女性如何突破窥镜将自我体验及其能动性公之于众。

二、寻求故事:对自我定义的修正

《素食主义者》是通过女主人公英惠的丈夫、姐夫和姐姐三人的视角,由《素食主义者》《蒙古斑(别名“胎斑”)》《树火》三部短篇小说构成的系列小说^③。该小说讲述了英惠从起初的平凡妻子直到一场梦后变成了完全的素食者和最终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与厌食症并存的特殊病例直至拒食想成为树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妹妹英惠与姐姐仁惠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从文本表面来看,两者的关系是矛盾的。一则因为姐妹之情,仁惠不忍心抛下妹妹英惠不顾,“从小时候被性情暴躁的父亲扇耳光的时候开始,英惠就是她这辈子一定要照顾的,是要让她付出像母爱那样的责任感的存在”^{[5]157};二则因为英惠与姐夫之间发生的乱伦关系,使仁惠知道自己根本没办法再跟英惠生活在一起,她无法忍受由英惠联想起来的所有事情^{[5]172}。然而,除去文本表面呈现的姐妹间存在的难以言说的荒谬、矛盾关系外,在韩江笔下姐妹二人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一种状态,一种对于没有故事的生活进行修正或改写的颠覆状态。那么,作者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修正或改写?显然,较为特别的是,藏匿于姐妹关系中的“隐含文本”,即替身关系。换句话说,变成世人眼中“疯子”的妹妹英惠是姐姐仁惠——对现实生活忍耐顺从、过着平淡无味的生活——的替身,是卑躬屈膝的、被压抑至无声生活的仁惠的另一面。但是,为什么会隐含着替身关系?如果我们回到文本中恪尽职守的仁惠那里,不难发现她看似平凡沉默的生活背后隐藏起来的的东西都与英惠的“反复无常”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惠异常的表现正是仁惠寻求她自己故事的表现。这

同样也许是韩江意欲借助姐妹间的联系突破窥镜的一种表现形态。在此方面,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表明的那样,“在我们女性能够写作之前,必须‘杀死’‘屋子里的天使’。”^{[2]22}也就是说,女性必须杀死男性幻想和建构的理想模式,“摧毁作为男性的‘作品’的那个僵死的自我,而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一个‘反复无常的’自我……她必须用‘个体性’来取代‘复制品的身份’”^{[2]25}。

对于英惠而言,起初她呈现的便是丈夫和父亲喜欢的“复制品身份”的自我。

我跟她结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她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跟可爱、才华、优雅毫不沾边的性格,对我来说是很安逸舒适的。^{[5]3}

我一直都不喜欢那些过‘度’的事情。

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她完美地扮演了平凡妻子的角色。^{[5]4}

爸爸的暴力是只冲向英惠……温顺而一根筋的英惠,不会看爸爸的脸色行事,所以只能默默地咽下所有的苦水。^{[5]190}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英惠本就是父权体系下最平常无奇的女性:作为妻子,她不会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作为女儿,她也只是父亲手中发泄的工具。然而,就在英惠陷入吃不下睡不着、总是做噩梦的状态下,丈夫并未给予任何关心,甚至在她决心成为素食者且变得“异常”后,丈夫选择旁观并提出离婚;而父亲面对变成素食者之后的英惠也只是强制喂她肉。显然,仁惠与英惠的处境是类似的:在不确信自己是否爱自己的丈夫时,便选择和他结婚;结婚后为适应丈夫的一切而努力改变自己,不辞辛劳地照顾丈夫;即使闹别扭,也想方设法尊重丈夫;同时,“作为长女表现出来的懂事

①2016年5月17日,一名23岁的女性在位于首尔江南站地铁站附近的一公共厕所内被一男子连捅数刀致死(见纪宇,刘军涛.韩国江南随机杀人案引发女性恐慌,两性不平等问题再成社会热点,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531/c1002-28399887.html)。

②哈维·温斯坦的性骚扰丑闻曝光后,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一个服务弱势女性的纽约社区组织者,提出了#metoo——“我也是(受害者)”口号。随后她的朋友,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转发,并附上文字:“如果你曾受到性侵犯或性骚扰,请用‘我也是’(MeToo)来回复这条推文。”之后,#metoo,频频出现在推特上,引来众多女性控诉性暴力和性骚扰(见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metoo控诉性骚扰百万人接龙转发;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努卡在推特发声支持,中国妇女报,2017-11-08)。

③三部短篇小说分别刊载于杂志《创作与批评》(2004年夏季刊)、《文学与社会》(2004年秋季刊)、《文学版》(2005年冬季刊)。

并不是早熟,而是一种怯懦,只是在爸爸的暴力下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方式而已。”^{[5]190}所以在父权的控制下,女性有限的选择、被驯顺和操纵的身体,便是英惠和仁惠的交集。

然而,当满是血的脸一次次出现在英惠梦里,当她决定吃素食,当她做出异于常人的各种行为且在这一过程中摧毁丈夫喜欢的理想妻子的角色,当她拒绝父亲暴力喂食的行为时,英惠与仁惠之间仿佛已变成平行关系。可以说英惠颠覆性的甚至说是“疯子”的形象及其厌食症的表现是和女性的个体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她对“身处其中的文化提供给她的有毒的苹果”^{[2]75}的一种拒绝。但即便如此,这一关系背后亦可看出英惠决定吃素食后的种种行为和意识也隐含和遏抑在仁惠被驯服的外表后面。因此,英惠的每次出场——她的“反复无常”——均可被看作是跟仁惠的压抑联系在一起,恰成对照。不过,对照并非对立,而是跟仁惠背后的隐含文本、寻求自我定义的故事相联。举例来说,英惠搞砸了丈夫得来不易的公司夫妻聚会——她没有戴文胸让丈夫变得狼狈不堪,她默不作声、毫无表情地凝视每个食肉的人使大家大为扫兴;然而,为了事业的仁惠总是面带微笑地接待客人,但每到晚上“总觉得自己疲倦得像一座孤坟”。家庭聚会上,英惠第一次清楚且坚定地拒绝了父亲的命令。而父亲的形象正如英惠丈夫形容的那样,“岳父是个极其大男子主义的人,深具一家之主的威严。他从来不会说关怀之类的话语……听说老婆的小腿被这样的岳父一直打到十八岁”^{[5]35}。然而,就在这般等级严格的家庭环境下,英惠“变得如此锋利,是为了刺破什么呢?”可以看出的是她想要摧毁父亲的绝对权威、摆脱“复制品身份”,同时自己做出选择。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包括什么?或许,它包括往回看这一行为,回望过去以及延续至当下并被社会化了的诸种结果。显然,这样的态度是韩江借用英惠,以最为普通的人物形象谈自己时代中的女性的现实处境以及社会进入的某种状态。

对于仁惠而言,她后悔家庭聚会上没在父亲扇英惠耳光之前阻止他,而是按照他的指示照做了。直到仁惠下定决心去看病,当她看见车站对面破烂的临时建筑和疯长的野草时,她意识到从记事起便默默在忍受,“自己仿佛没有真正享受过生活”,“自己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死了,眼前痛苦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戏剧,或者此时的自己只

是某人的幽灵。死亡像是走失很久又重新相逢的至亲那样,让她觉得无比熟悉”^{[5]199}。如果审视小说通篇内容的话,此处借用植物予以告诫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植物亦是仁惠寻求自我故事的道具。此外,这也跟英惠想蜕变成植物相关联。

“我现在不是动物,姐姐。”

“我可以不再吃饭什么的,只要有阳光,我就能活下去。”

(……)

“不多久,语言和思维,都会消失的,很快!”^{[5]185}

“我听到了声音。”

英惠扎着输液针,躺在床上说到。

“只是听到了声音,所以出去找找而已……但是再也听不到那声音了……所以只能在那里等待。”

“在等待什么?”

(……)

“被雨溶化……所有东西都被雨溶化……要渗进地面里去。如果想再次生根发芽,只能这么做。”^{[5]194}

英惠反复提到自己将变成只进行光合作用不需进食的树,如若想生根发芽获得重生就必须被雨溶化掉所有东西。那么“所有东西”指的又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象征父权制下施加给女性的社会、经济、心理上的暴力和控制,是英惠摆脱现状必须超越的东西。因此,作者借助植物/自然既揭示了仁惠真实的(已死)生活,同时伴随着英惠的愿望又体现出在这种没有故事的生活中终将能讲述自己的完整故事,寻到自我定义的可能性。此外,某种意义上看似处境和形象完全不同的两姐妹实则相去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拒食的英惠像是变回婴儿,这意味着什么?是一个逃避的场?还是追寻颠覆性的意象,从而摆脱所谓的“正常人”,表达真正的自我?如果说变回婴儿只是为了找寻对现实逃避的一个场,那么英惠的“疾病”便意味着并未故意指向什么——尤其是社会现实和女性的悲剧。另外,对于英惠而言,变回婴儿并非是她没有意识,正相反,“这不是没有意识,而是把意识紧紧地集中在某一处”^{[5]207}。她的病症只是为了寻求自我表达的权力,是她发声的工具。表面上,英惠的“疾病”看似使她与现实社会相脱离,或是使她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然而,这样的表现并不意味对女性处境

的罔顾,相反,正是通过这样的表现使得“疾病”具有了一种“意义”、一种“讲故事”的声音。正如桑塔格分析的那样,“服装(从外面装饰身体之物)与疾病(装饰身体内面之物)成了对于自我之新态度的比喻象征”^{[6]94}。可以说,英惠的“疾病”是其将所有意识强烈地牵至某一处,即对于自我的新态度,在看似患病的、疯狂的、格格不入的状态中试图颠覆女性所谓“与生俱来”的他者处境的地方,同时也是在讲述男性文本之镜/现实社会隐瞒的“真实”。就像中译本小说封皮上所说:“不要叫我的妹妹‘疯子’,真正疯狂的,是对她做出种种冷酷之事的、号称‘正常人’的家伙们。”恰是基于此,“疾病”仿佛成为反映英惠自身话语的面具。而这样的面具也许正像是“表面文本的‘女性文本’”^{[7]13},也就是软弱的、没有语言强威的女性语言或是“无法/本不能发声的女性语言形式成了女性用来颠覆‘固应是/不能是’的状态的一种掩护。在这样一种表面看来似乎被动的、失常的、卑微且令人难以接受的掩护中暴露的信息却字字真实。同时,这个面具也为那些‘英惠们’找到了一种将她们的声音公之于众的特殊方式。”

三、悲剧:“杀死”“屋子里的天使”

除了通过探寻上述英惠与仁惠之间存在的替身关系,从而发现英惠所患“疾病”的“意义”及其揭示的“真实”外,如若继续探索《素食主义者》所表达的精神的话,那么,其意义在于反传统/披露现代韩国社会固有之积习,其“反”在于以彻头彻尾的悲剧代替寻以为常的“幸福结局”。叔本华曾言及三种悲剧:“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8]29}若用这种观点来考察《素食主义者》,想必小说对应的则为第三种悲剧。在父权制结构下,女性不得不接受“命中注定”受压迫、被剥削的处境,“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8]30}。

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得到休息。可是不管她多么努力,婚后的他还是显得很疲惫。^{[5]159}

为了适应他的语气、品味、味觉和睡觉习惯,她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其他的

小夫妻一样,他们在一开始也为一些事情闹过或大或小的别扭,可是没过多久,她都能做到该放下的就放下。^{[5]191-192}

正如仁惠那样为迎合丈夫的喜好和习惯,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然而却换来“自己了解的他只是一个影子”;术后的创伤虽然痊愈,但体内的伤口却漆黑看不见尽头,仁惠明白她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自己早已死了。因此,仁惠可以看作是韩江有意创作的悲剧人物,作者用平凡而又似曾相识的人物揭露在父权制社会背景下的韩国普通女性人生之真相。仁惠的出现代表的不是个别人的故事,她更是再现了普遍存在的女性们的生活。此外,英惠以素食坚定地反抗丈夫和父亲的权威后,却难以逃脱姐夫对她肉体的幻想和性欲以及男性医生对她进行的残忍喂食,也许英惠想要用“疾病”“杀死自己”来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

由此观之,《素食主义者》可谓悲剧。试问身为女性作家的韩江为什么将女性形象置于悲剧之中,作者有什么意图?悲剧又有什么意义?

也许有人会说艺术应努力宣扬“真、善、美”而尽量忽略悲剧。毫无疑问,那些积极主动的角色对许多读者有所裨益,尽管如此,难道人们不喜欢悲剧吗?显然不是,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9]3},并且悲剧亦可以带来“悲剧快感”。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悲剧的作用是“激起怜悯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9]152}。同时,朱光潜将“情绪的缓和”灌注于“净化”的解说中:“悲剧的怜悯和恐惧以悲剧的艺术力量产生积极的快感,当怜悯和恐惧在悲剧中得到表现,被人感觉到时,附丽于它们的能量就将得到宣泄,痛感就被转化为快感,从而更增强悲剧中积极快感的力量。”^{[9]228}基于此,韩江之所以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置于悲剧色彩中,在于她将女性在美学上或是男性文本中所谓的理想模式杀死了,她以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角度,从我们未加注意的寻常一面深入进去:作为平凡的妻子、女儿,她们不断被噩梦和失眠困扰,这样的过程对于英惠和仁惠而言是可怖的。然而,即便如此,她们也已经僭越了男性权威下限定的“完美的”或是“无足轻重”的形象;当英惠被医生强行将软管插入鼻孔,“鲜血从软管中、英惠口中接连喷出来”时,当仁惠推开主治医生,抱住英惠时,对于读者而言也许同情、怜悯和恐惧在这一刻得

到发泄,正如金艾琳所言:“在极其平凡的常人眼中,只有精神病人或患者心中存有一个与他们内心世界共处的人。而跟随这位同行者的视线,我们方才明白,伤痛并不是一个人的事。”^{[10]351} 作为观者无论我们是否既有感情的深入又有清醒的判断,至少在这一刻如果我们对此有所思考甚至是反思,那么这样的悲剧便是冲击心灵的媒介。

四、结语

当今世界,性别平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女性问题则成为我们研究当代社会绕不过去的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对于英惠和仁惠而言,这一切苦难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甚至努力探寻符合逻辑的因果关系。父权制下对女性的压迫似乎是那么明显,以至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唯一的原因,就像任何结果必定会有对应的原因,而任何原因也必定会有其对应的结果一样,显然这样形而上学的看法是偏执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仁惠与英惠姐妹间存在的“隐含文本”的基础上考量的话,父权压迫、男性权威是小说《素食主义者》中表露出的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此外,将《素食主义者》定义为悲剧亦是值得注意的部分: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讨厌看到灾难和悲剧发生,那么为什么《素食主义者》会如此畅销?想必正如朱光潜对悲剧的认识那样:“表面看来,悲剧内容大多是可怖的东西,但它实际上绝不仅止于此。悲剧绝不仅仅

是恐怖。恐怖只是使人感到痛苦,最后给人以阴郁和沮丧的感觉,而悲剧却令人感到鼓舞和振奋。”^{[9]214} 也许悲剧正是小说突破窥镜的途径之一,小说作者所期待的现实意义也许正在于通过仁惠与英惠悲剧的表达,帮助更多女性乃至世人去体认现实世界中女性难以描绘的生活和生存问题。

参考文献:

- [1] YTN. 韩江“素食主义者”销售 68 万册…本年度最高销量[EB/OL]. (2016-12-13) [2020-11-11]. https://www.ytn.co.kr/_ln/0106_201612132200034694.
- [2]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 阁楼上的疯女人(上)[M]. 杨莉馨,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김경연. 근대 여성문학의 탄생과 미디어의 교동[C]. 서울:소명출판,2017.
- [5] 韩江. 素食主义者[M]. 千日,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 [6] 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 赵京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 [7] 苏珊·S 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黄必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8] 王国维.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C]. 周锡山,评校.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 [9]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 张隆溪,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 [10] 김예림. ‘식물-되기의 고통 혹은 아름다움에 관하여—한강 연작소설 『채식주의자』』, 창작과비평, 2008(1).

Penetration of “the Queen’s Sight Glass” in *The Vegetarian*

ZHU Qing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n *The Vegetarian* (novel), the author, Han Kang skillfully adopts the expression form of “implied text” between Yeong-hye and her sister In-hye, trying to show readers the hardship that they have experienced, through which to reveal the disadvantaged and sacrificed situation of females under the solid patriarchal structure in Korean society. Meanwhile, Han Kang puts females in the “tragedy text” to transcend the ideal female model defined by male authority. *The Vegetarian* shows the special feelings that modern Korean female writers enjoy, and provides a poss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learn their endeavor at penetrating the sight glass of male tex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umanistic care.

Key words: *The Vegetarian*; implied text; tragedy text; female writer; sight glass

(责任编辑 合壹)